

DOI:10.16161/j.issn.1008-0597.2004.03.022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Radio & TV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2004年第3期(总第130期) No. 3, 2004(Sum No. 130)

法的规范化、系统化的理性思考

The Rational Consideration of the Law Systematizes and The Law Normalizes

滕晓慧¹ 姜言文²

TENG Xiao-hui JIANG Yan-wen

(1. 内蒙古财经学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50;

2. 乌兰浩特市人民政府, 内蒙古乌兰浩特 137400)

(1. Inner Mongolia Finance Institute, Huhhot Inner Mongolia China 010050;

2.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Ulanhot, Ulanhot Inner Mongolia China 137400)

摘要: 中国在依法治国的实践中, 不但要注重立法的健全和完善、简洁和通俗, 同时更要注意法的规范化和系统化, 使法对于社会和公民的价值需求得以全面实现。

关键词: 价值; 法治国家; 法的系统化; 法的规范化; 法的通俗性

[中图分类号] D9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597(2004)03-0077-04

Abstract: In the practice of govern the country by law, china should not only make a point of the progress and perfect of legislation, but also notice the law as long as tenatizes and the law normalizes at the same time. It making the law for the society's and citizen's value request had been realized completely.

Key words: Value; Govern the country by law; The law systematizes; The law normalizes; The popular of law

“法治国家”是当今世界普遍认可的国家或社会模式。人们普遍认同:法治是最能使人得到全面、充分尊重和发展的手段。据此,人们把法治的涵义理解为具有丰富和明确价值取向的意识形态。法的规范化是依法有权制定法的各级国家机关就正在制定或拟定的规范性文件所提出的要求、标准,目的在于提高各种规范性文件的质量,从而使一个国家的法的各种表现形式成为一个严谨、协调、一致的整体。法的系统化则指对已经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加以整理、归类、解释、修改。法的规范化、系统化是立法的重要环节和补充,立法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基础,无法可依,就不可能用“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适用法律,就谈不上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和全社会的自觉守法,更无法奢谈“法治国家”。法的规范化、系统化对法治国家的价值,就在于通过这样一个过程,使一国形成较为完善的、稳定的、逻辑的法律体系,使法的表述简洁、明确,使法律真正成为调整社会行为的最有效的手段,从而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使法对于社会、对于公民的平等、公平、正义、秩序、效益、人权等价值需求得以全面实现。

一、法的规范化、系统化的历史典范

历史上自有了法律以来,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就已采取过法的系统化、规范化的措施。不过,专制政治的法的规范化、系统化的出发点无非是强化专制统治,方便统治者适用法律,而并非以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维护人类权利为立足点。但因此却也深深影响了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政治制度下公民对法律的适应度,进而也以意识形态所独有的缠绵不断的方式渐渐地、顽固地影响着后世的政治、法律、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

罗马帝国是西方古代奴隶制国家,它的著称于世不仅仅以它的疆域广大(西欧大部分地区和地中海沿岸),更在于它的法律文化对后世的影响。罗马法也称查士丁尼《国法大全》,是古罗马帝国法律的统称,在罗马帝国形成、扩张、灭亡的过程中,罗马统治者对法不断进行着制定、汇编、修改,尤其是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在他的倡导主持下,对罗马法及法学专著进行了系统的编纂,其中包括《查士丁尼法典》、《法学阶梯》、《学说汇纂》和《新律》,形成了著名的“罗马法”。《查士丁尼法典》是对罗马帝国历代皇帝敕令的系统化汇编。《法学阶梯》是罗马法学家盖尤士的著作,是供法律学校采用的私法教科书,查士丁尼对其进行了通俗、简捷的修改,并赋予其法律效力。《学说汇纂》是对法学家们的著作、学说、法律解答等进行的汇集整理,构成了查士丁尼法的规范化、系统化的最重要部分,也赋予其法律效力。《新律》是对查士丁尼在位后30年敕令的搜集总结,作为对《国法大全》的补充。规范化、系统化后的《罗马法》总计66卷,另附新律124条。虽然没能挽救罗马帝国灭亡的命运,但却开辟了法的历史继承与创新发展的新篇章,成为法的稳定性、连续性、权威性与废、改相结合的典范。同时,对资本主义国家法的产生发展发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在于它的法律制度、立法技术、法律术语等方面的影响,也在于它的法律原则、思想、意识的影响。如《拿破仑法典》就是参照罗马法而形成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最有影响的民事法典,尤其是在私法方面,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万民法与自然法的观念、法人制度、所有权与占有制度、私人权利平等、遗嘱自由、契约自由等原则,不但被兼收并蓄,而且在资本主义国家市民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私法意识,进而形成了资本主义法学领域的两大法系之一——大陆法系。

中国进入阶级社会后,也不乏统治者进行立法系统化的先例。诸如,秦朝《法律问答》共187条,对《秦律》条文、术语、立法意图进行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汉朝的丞相萧何参照秦法制定《九章律》。唐朝永徽年间长孙无忌对《贞观律》进行修改、解释,形成中国封建社会的代表性法典《唐律疏议》。宋朝的编敕、编例活动,使皇帝敕令与司法机关颁布的审判判例,成为宋朝主要的法的渊源。还有明朝编纂的《大明会典》,清朝编纂的《大清会典》为统治者调整政治、思想、经济统治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由于中国封建时代法的内容以刑事法律为主,重农抑商,皇权至上,因而形成了中国百姓“重刑轻民”的思想意识。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民众意识相反的发展趋势是:皇权(官权)大于法律、刑法神秘化、权利小于权力、义务大于权利等思想意识通过历代统治者的法的规范化、系统化活动不断地强化,直至今今,很大一部分人(包括官员)封建专制的意识仍很强。

由此可见,法的规范化、系统化不仅涉及到统治者应用法律的有效性,更触及到对民众的法律意识、法律倾向的影响、培养,涉及到最终法律能否被自觉遵守,社会秩序是否稳定,民主政治能否长久。

二、我国法的规范化、系统化的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彻底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代之以新中国的法律,使新中国法制建设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其后的各种政治运动却阻碍了中国法制化的进程,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的法制建设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法的规范化、系统化根本无从谈起。改革开放后,为了我国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逐渐意识到民主法制的重要性,也意识到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法制经济,于是大规模着手制定法律,并取得了立法工作的伟大成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400多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制定了800多件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制定了8000多件地方性法规),为保障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我国跻身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之林奠定了基础。然而,不容讳言,我国的法制建设工作,包括法的规范化、系统化工作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就目前情况看,笔者认为我国法的规范化、系统化工作存在以下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一,立法中指导性原则和具体原则无规定或规定模糊,使执法中遇到特殊问题时难以适从。德沃金在1963年发表的《司法自由裁量》一文,认为法律不仅指规则,也指原则、政策和其他标准,因而他反对自由裁量。我国在立法中应有相关原则的具体规定,且这样规定应符合社会所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第二,立法的废除、修改速度过快。以其是涉及经济的法律和刑事法律,不但普通公民感到不适应,甚至是执法者、法律研究者在适用时也常遇尴尬。长此以往,法的稳定性、权威性,甚至是法治国家的理论都会受到怀疑。第三,法律解释、法律编纂欠缺标准。在我国,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有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众多的解释和法律条文之间却没有统一的原则加以指引,随意做扩大解释或偷换概念,甚至做与原立法条相违背的解释。同时,也缺少有关机关用非常先进、现代的技术将法进行汇编、规范,导致同一司法机关对同一类型案件审判结果截然相反的情形时有发生。究其原因,有时并非法官刻意枉法裁判,也并非执法人员法律水平低下,相反,不能有效、及时收取到解释信息,倒是一个重要原因。第四,对法律规范的废除方式太多,实践中,既有口头(会议讲话)宣布无效,也有新法中明确规定旧法无效,还有新法颁布时旧法自动无效,甚至有在某一文件中宣布一系列法律规范无效等。对专业法学、法律工作者而言,经分析后,容易掌握,但对绝大多数民众而言,诸多的法律、法规、文件、命令、批复、解释以不同方式宣布无效,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相关知识,更没有意识去辨析、理解,使法在民众思想意识中更显得陌生。第五,法的效力等级在实践中界限模糊。法的效力等级是一国法律体系中不同渊源形式的法律规范在效力方面的等级差别。一般而言,除特别授权外,制定法律的机关的地位愈高,其法律规范效力越高;在同一主体制定的法律中,以严格程序制定的法的效力高于以一般程序制定的法。在我国,宪法、法律的效力大于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后颁布之法优于先颁布之法;特殊法优于一般法;授权立法等同于授权机关自己制定的法。但实践中,没有明确的文件概括这些规定以便于普通民众掌握,同时,效力较低的规范性文件中一些与较高规范规定相矛盾的条款,却被广泛适用(法律适用者各取所需),使法的指导性、教育性功能大打折扣。

三、法的规范化、系统化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立法所体现的价值应与社会主流文化、道德的价值取向一致 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基石,而社会秩序的形成在于对人的行为的调整,因而需要行为的各种规范和标准。在阶级社会中,法是调整人最基本、最有力的规范,但不是惟一规范,还要辅之以道德、宗教、政治的规范。法应是调整人行为的最低限度规范,法只有符合绝大多数普

通人而非“英雄”的思想行为观念,才会得到较为普遍的遵守。一个人行为超越了这个限度,就会危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被视为违法。法的这个限度如何把握,其中之一是要注意法的价值应与主流道德、文化思想的价值相一致,并把这些思想兼收并蓄为法律规范的一部分,将高尚道德、先进文化的思想价值吸收为法律原则。这样法才可能以一种亲切、熟知的形式改变公民的法律意识,自觉引导公民行为。相反,如果法的价值灵魂与主流道德思想价值相冲突,那么统治者无异于自绝于民众、自掘坟墓。二战时期法西斯国家的法律,其价值显然违背本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平等、正义、公平等价值观念,最终的结果是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抗和道义、法律的谴责。所以,“明智的创制者也并非从制定良好的法律本身着手,而是事先考察一下,他要为之而立法的那些人民是否适应于接受那些法律”(卢梭语)。

在人权意识高度发展的现今,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成为主流道德、思想意识的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尊重人的各种权利,包括生存、人身、人格的最低限度权利,政治权利和自由的人的本质权利,经济、文化、社会的基础人权。对这些人权的确认、保护若只停留在道德权利的应有状态,人权就不能得以确认,因为它常会面对侵害的危险而无法进行及时有力的救济。所以通过立法将人的这些权利加以确认,那么人所崇尚的正义、平等、公平、自由等需要就会通过立法、执法、守法得以保护和补救。于是法就会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规范,同时还可以弥补立法空白,有助于法的稳定性、权威性,有助于国家稳定。

(二)注意法的稳定性 朝令夕改的法,既丧失了法应有的引导、教育、惩戒等功能,也破坏了法维护政治社会秩序的作用,欠缺权威性。进一步而言,现代法所体现并追求的人权的各种价值观念就无从鲜明地体现,那么人的各种需要就无法真正实现,社会文明就会被随意践踏。因此,如何保持法的稳定性,是立法的最基本原则。首先,立法者要具有广泛性。这就需要我国的人大代表应能代表各阶层民众的需要,具备各行业的专业才能,同时还要有公正的理念,有独立见解,这样他们的意见被采纳后才符合实际,才可能有科学预见性,从而维护法的稳定。其次,立法者应具备较强的法律思想、法律知识。价值中哪些以原则形式出现、哪些以规范表达,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如何表述,权利、义务表现形式是否统一,是否做到实体正义(公平分配权利义务)和程序正义(公平实现权利义务)统一,法律术语是否准确等,这些问题的处理需要专业的法律研究者胜任。这样,所制定出的法律才具有形式上的规范性和实质上的科学性。古罗马法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化领域的重要宝库,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如此之大,其原因之一就在于罗马统治者非常注重法学研究、法学教育,尊重、重用法学家,才出现了著名的法学研究的“古典时代”,涌现出诸如帕比尼安、保罗、乌尔比安、盖尤士、西塞罗等著名法学家及法律思想家。这些法学家制定修改的法律,行文言简意赅,法律结构严谨、通俗、明确、灵活。这正说明了法的出现,需要职业的法学家阶层。因而,我国立法队伍中法学家、法律思想家应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样才能使所制定、修改的法律更具规范性、适应性、被认可性、接受性。

(三)确立法律解释的规范化、系统化标准 从目前世界各国的法制情况看,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通常是官方解释(正式解释)。所谓官方解释是指法律规定的有权机关按法定职权和程序对法律所做的有约束力的解释。法律解释的系统化、规范化主要涉及一国法律解释权限划分是否合理,是否运用了较为科学的标准、原则、方法对空白的、模糊的、矛盾的法律规定本身进行了判断、说明、理解。它体现了法的公平性和效益性有机结合的价值取向。

法律解释的必要性是出于法与社会生活的矛盾和社会发展对法律解释的需要。法律规范

是抽象的行为标准,要借助专门术语概念表达,具有概括性特征,而人的具体行为千差万别,如何用抽象的规范调整具体行为,需要准确、及时地对法加以评价、理解,以及时消除适用上的分歧,从而维护法的基本精神和法的稳定性。法律解释的“及时”体现了法的价值的效益性,而法律解释的“准确”则体现出法的价值的公平性。效益性价值为人们及时提供适当的行为模式,在行为合法或不违法前提下获得应有的行为取向,为人们争取最优化的目的提供简便、及时的程序保障,做到社会成本的减少。公平性价值在我国体现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法律解释的效益性和公平性在现实中真正得以实现必须通过它的规范化和系统化。首先,应通过法律确立有权解释法律的机关。世界各国目前有三种做法。其一是将立法机关作为法定解释机关。其二是将多个国家机关确定为有法律解释权的机关。其三,由专门机关对法进行解释。我国采取了第二种做法,除国家立法机关外,各最高司法机关也有法律解释权。这种优势似乎在于他们所做的法律解释更能及时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然而要注意,司法应独立于立法,各种国家机关权力的行使应基于分工和制约,否则这种法律解释往往难以合理地分配公平与正义。其次,法律解释应有一套原则标准。原则之一就是各种解释应贯穿同一性指导思想。在我国,应以尊重人权为基础,坚持“三个代表”。原则之二是要使各种解释有规范的、逻辑的表达和技术性规定。

(四)把握好法律汇编、法典编纂的通俗性的价值取向 在探讨法治国家的同时,我们不得不进行这样一种思考,法作为一种治国手段,其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怎样维护法的地位,在立法中有两种技术性倾向,一种认为,法是至高无上的,立法、执法、司法是法学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的专门工作,因而法律汇编、法典编纂用语应非常专业化,普通民众没必要去理解它,即法是神秘而深奥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法应通俗、明确,所有法律都应是针对未来、公开和明确的,法律若要民众遵守,人们就必须知道法律规定的是什麼。出于同样理由,法律含义应是明确的,一项模棱两可、含糊其辞、晦涩或不确切的法律,很可能造成混乱,至少会使一些希望用法律规范的人感到迷惑。第一种观点虽然目的是竭力推崇法的重要地位,但它过分使法神秘化、专业化。这在历史上确实存在,因为这可以凸现统治者的权威,也可使统治者更好地愚弄民众。其神秘化过程体现了统治者不平等的价值观。第二种观点,似乎有看轻法律的倾向。但就实质而言,法的通俗性能更好地突出法制地位,更有利于依法治国。首先,现代国家普遍认为,法必须建立在尊重人类人格基础上,国家一切权力必须来源于法律,而且要依法执行。那么只有通俗、明确的法,才能使人知晓自己的权利,保护、救济自己受损的权利,实现法所蕴含的公平、正义、平等的内在价值。其次,从法的功能看,只有明确、易懂的法,才能正确指引人的行为,正确评价自己的行为和主动预测行为的后果。才能培养人的法律意识,自觉地遵守法律。再次,历史上,简洁、明确的法往往是一国繁荣的体现。如欧洲古罗马和我国封建时代的盛唐,都以其法的言简意赅而使其成为大陆法系和中华法系的基础。

所以,我们在重视法律汇编、法典编纂的规范性、系统性的同时,也要注重其通俗性。在立法语言上要言简意赅;在立法技术上严格遵循法的效力等级原则;在法的修改、废除的标准上,应采用新法中明确宣布旧法及相关有效解释的条款无效的方式;在汇编法律中,除采用部门法分类和时间分类的标准外,应在每一规范性法律文件后附加汇编有效解释,从而达到通俗、易懂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周 枏. 罗马法原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

[2]张文显. 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6.

[收稿日期]2004- 05- 28

[作者简介]滕晓慧(1966~), 女(蒙古族), 内蒙古翁牛特旗人, 内蒙古财经学院法学系, 副教授;姜言文(1965~), 男, 内蒙古海拉尔市人, 中共乌兰浩特市委常委、政府副市长。